

面向未来的反思与创建

——2019年理论评论综述 □李永胜 高建平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恰逢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019年的中西美学、文论研究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还多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成果,学者们有的对中西经典做出新的解释,有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新的开拓,有的对前人提出质疑,有的则深入到历史语境的细处,找寻事情的真相,有的则直接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一、将现当代文论、美学历史化

当下永远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意义也始终在当下。中国的现当代是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尤其重要。建构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既要面对当下文学实践,又要从现当代文艺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高建平看来,革命时期的文艺理论资源、苏联文艺理论资源、西方文论资源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都很重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同样需要,“规划”与“解释”各有作用,关键要看能否面对文学实践。(高建平:《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蒋述卓也是以这样的眼光来考察新中国70年以来“话语选择”之得失的。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理论建树,乃是因为“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蒋述卓:《7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四个问题》)而所谓本土化的尝试即是根据当下实践作出改变和创造。

杜卫则强调文艺美学的中国现代资源和现代传统。他认为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本国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去。”(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而中国文艺学的现代传统,在杜卫看来是既融合中西理论又重视当下实践的传统。王一川从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经历的“美学论”“文化论”“语言艺术论”三次转向来看文艺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文艺美学要回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初心上,既要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又要重视文学对于其他艺术,甚至整个文化的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导向符合我国自古就有的诗性文化传统。(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又重视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这样的结论也只能从中国的文学实践中得来。

历史的意义在当代,但我们却不能凭借着当代的需要,去任意解释甚至虚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真实,也由于没有现实和存在逻辑而失去了对于当代的指导借鉴意义。在对于历史的去伪存真方面,在将历史客观化方面,以上几篇文章也做得很好。

二、将中国文论、美学范畴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尝试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路径和做法是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当中总结、归纳出一些概念、范畴,并将这些范畴上升为一般的理论。由此构建出来的理论不仅应该能解释和指导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实践(尤其是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而且还应该在在世界范围内解释一些文学艺术现象,并成为世界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重要参考和组成部分。这样的工作需要由许许多多具有理论思维的学者来完成,201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便有一些这样的成果。

薛富兴运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思想,将古代美学中的“品”上升为一个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畴。在他看来,“品”既体现了显明的中华文化个性——审美判断对饮食消费行为(品尝食物滋味)之根源性依赖,因而具备浓郁的感性特征;它同时也代表了古典审美的精致化——对特定对象审美价值与量的细腻体察与鉴别,因而呈

现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因此“可以走出中国美学,进入美学基本理论,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学理意义的基础性审美范畴。”(薛富兴:《品:一个关于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畴》)庄威则借助于康德的“共同感”探讨了中国思想中的“情”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情’恰好具有事实和情感的二重性,也具有沟通感性和思维、个人和公共性的同效力,尤其戴震提出的‘情理相契’的思想,可视为在中国思想里沟通实践、审美、伦理和政治诸领域的先验公理。”(庄威:《论康德美学中的‘共通感’思想及其理论效应——兼及中国思想中‘情’的问题》)

张江等人建立起“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在今年所做的努力属此种路径。在《“解”“释”“辨”》中,张江辨析了“解”“释”“论”“阐”在汉语语义上的联系和区别,得出结论说:“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李春青认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需要深入地梳理、分析中国古代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为此,他考察了先秦儒学阐释学理论及其实践。他认为,“孔子之‘述’、孟子之‘说’、荀子之‘辨说’均含阐释之义。”不仅如此,在李春青看来,“儒家的阐释活动以为天下制定价值规则为鹄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阐释的公共性’特征。”(李春青:《论先秦儒学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

当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路径或方法,就是把西方或外来的概念、范畴、理论做出一些改变,以便同中国的文艺实践相适应,即将它们中国化,从而产生出新型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而且这两个路径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往往是中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构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如果坚持这两种路径的结合,像李泽厚等人所做出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仍会出现。

三、对经典和前人研究的质疑与新思考

理论进步重要的表现和动力之一便是对前人尤其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理论的质疑。如果一个人质疑了前人的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自己的见解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还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理论在他手上取得了进步。在今年的文艺学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对经典和前人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新的理解。

邓晓芒检讨了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并对之进行了改造。邓晓芒认为,“审美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判断力’(哪怕是‘反思性的’判断力),而只是情感的传达能力。……情感的传达性本身其实就已经显示了情感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不需要用先天的认识能力来保证其普遍性。”(邓晓芒:《论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及其改造》)而情感之所以具有普遍的传达性,在邓晓芒看来恰恰不在于其先天性结构,而在于其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

卢文超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出发来分析艺术的物性与非物质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可以完美地复制艺术的物性,但无法复制艺术的事性,这导致了灵韵的丧失”。但在卢文超看来,“由于灵韵并非原作的物性,而是原作的事性,因此,这种事性尽管可能会消失,尽管无法通过技术复制而获得,却可以通过讲述而重新获得……因此,当事物之物变成无物之物后,依然可以通过进入新的事件,重新变成事中之物,重新获得新的灵韵。”(卢文超:《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杨磊对于布拉格学派美学的非形式要素做了思考,与以往人们将布拉格学派看作纯粹形式主义美学不同,他认为,“对于布拉格学派来说,自律的艺术恰恰是实现其现实诉求的必由之路。”在杨磊看来,“布拉格学派面对的是中世纪的‘封闭宇宙’崩溃之后,赫然洞开的‘无限世界’。捷克民族急需在这样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秩序。……一种向内的转的、自我导向的语言理论,以及表征着自我导向的自主理性的民族艺术和艺术因而登上了

历史舞台。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试图塑造一个不受外界干涉、独立自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杨磊:《探寻美好生活: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学》)

在理论及学术上,对于前人的质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有根据。根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逻辑与事实。一种理论、一种看法,如果不符合理论的逻辑,在道理上说不通,那就应该被质疑;但说得通的也往往不可靠,还要经得起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理论上的思考往往忽视后者,以上几篇文章从逻辑上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否符合艺术与历史的实际,则还有待检验。

四、深入历史语境的细部探寻理论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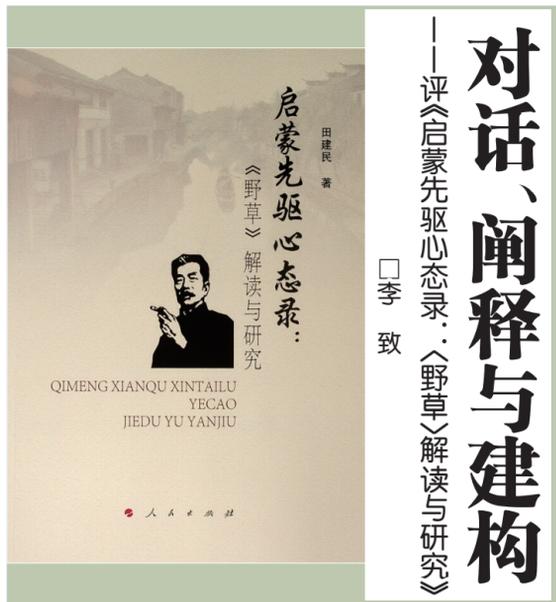
再普遍、再一般的理论都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历史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理论的普遍性恰恰是相对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往往会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这也造成了对此种理论的误解。因此打扫尘埃,重新发现理论之所由出的具体语境,并据之再重新理解此种理论便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这样从具体历史语境来理解的理论,才是活生生的理论,才有可能更好地运用在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更好地被重新理论化、普遍化,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的文论、美学研究有些成果就能看到理论背后的具体现实。

周维东对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的重新梳理和思考就进入了历史语境的细部。他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艺实践,在早期“形式”选择上面临内在困境:一方面,为了延续新文学的成就,承载革命的新内容,文艺形式要有创新;另一方面,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接受,文艺形式又必须与群众熟悉的旧形式保持一定的联系。因此,“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革命文艺建设的内部问题,一个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般问题。就其在抗战时期发生的过程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革命文艺建设的迫切性,‘民族形式’论争不会首先在延安提出,并成为文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事件’。”(周维东:《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所以,延安的“民族形式论争”首先不是一个关于形式的理论论证,而是一个革命文艺的实践问题。刘卓则探讨了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在她看来,“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李雪莲从朱光潜和鲁迅争论的语境出发去研究朱光潜的“静穆”说。在她看来,朱光潜之重视“静穆”乃是借用西学来回归中国古典,即“寻求类似中国文化所曾经给予中国文人的精神‘皈依’‘安顿’。”之所以绕道而行,是因为“作为‘西方学问’,希腊文化在‘新文化’中有着当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使人对系于其上的观点‘敢于自持’”。因此,李雪莲认为,朱光潜的“隐在目的是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寻求某种精神的安顿和安静。”(李雪莲:《重申“静穆”说——从鲁迅与朱光潜的“希腊”论争说起》)

很多概念、范畴与理论,只有进入到历史与语境的细部,我们才会对之恍然大悟,才会更加理解其必要性,才会更加理解提出者和倡导者的苦心与理路。也只有更好地理解,超越和创造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具体,但却弥足珍贵。

概而观之,201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研究者有的进入历史的细部,有的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趋势;有的致力于发现概念背后的力量,有的仔细梳理概念自身的发展逻辑;有的致力于对前人的批判,有的则开始展开较为宏大的理论建构。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未来的生机和活力。



《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启蒙先驱心态录》)是田建民教授近些年鲁迅研究的集腋之作。田建民教授早在2004年就开始从事鲁迅《野草》研究,但比较集中研究应该是从近些年开始。作者连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长城》等刊物上发表的《野草》系列重读文章让人耳目一新。《启蒙先驱心态录》一书中所收的二十几篇文章分开单篇独立成章,合起来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作者将《野草》置于五四启蒙的语境下,探隐发微,认为“启蒙是《野草》的总主题,是对鲁迅创作《野草》意蕴和心态的深层立体的把握。《野草》的23篇散文诗就是从与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不妥协和韧性战斗和执著地揭露与批判、面对启蒙的困境的困惑与质疑及对新的希望的不懈寻求等方面,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投身启蒙的执著与坚守以及面对启蒙困境时的内心的困惑与焦虑。”这种观点初看似乎并非创见,但通读全书,我们发现作者行文贯穿着“回归鲁迅”本体的研究努力与意图。作者的结论是基于学术对话基础上的阐释,结论具有启示意义,而且研究方法具有学术建构价值。因此,这是一部体现着作者一贯扎实学风,但学术功力更见道劲老辣的特著。

在本书总论部分近4万字的研究现状的学术梳理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详细梳理了《野草》出版后近百年的研究史,从启蒙与革命、社会分析与历史分析、情感道德、比较影响、西方理论批评话语和美学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回顾。作者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分类或许尚有待商榷之处,但就学术史的建构而言,这部分梳理堪称化龙点睛之笔,与作者对《野草》作品的阐释交相辉映,构成了该书学术价值的一大亮点。近百年的《野草》研究成果累积,为解读《野草》的真义提供了各种角度和可能,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且不利于鲁迅研究健康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者以创新而创新,人为拔高鲁迅《野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过度西化鲁迅在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完全背离了鲁迅创作初衷和心态,“回归鲁迅”成了一句空话。《启蒙先驱心态录》则在学术对话基础上,采用历史-美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认为《野草》是以形象象征的方式艺术地呈现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五四落潮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复杂的心态与情感,认为孤傲、悲壮、决绝和“怒其不争”的愤激是鲁迅在这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普遍心态和情绪。

作者并非一味用“启蒙”的总主题框架束缚《野草》的阐释,而且将“启蒙”作为一种还原和敞亮鲁迅创作心态的文化场域,致力于在这种场域下发现《野草》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在《秋夜》中,我们体验到的是诗人的孤傲与无奈;在《过客》《复仇》和《复仇》(其二)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精神文化的荒原感和对不觉悟群众“怒其不争”的愤激之情;在《这样的战士》和《希望》中,表现的是在“无物之物”布成的“无物之阵”和“空虚中的暗夜”这些笼罩在诗人心头无法摆脱和驱散的旧传统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阴影或幻象的包围和威压下,诗人感到四面受敌,时刻处于“反抗绝望”的短兵相接的紧张战斗状态。而在分析《一觉》时,作者认为《一觉》是鲁迅在战乱中编校青年们的文稿时因青年的觉醒和反抗而倍感欣慰,故此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予在这些可爱的青年们身上,并对他们的觉醒和反抗给予热情的赞颂。同时在文章的风格方面也有所区别,《一觉》不同于《影的告别》《死火》等诗篇主要用象征的手法,以梦幻式的奇崛意象和极具张力的语言形成晦涩蕴藉的风格,该文以写实与抒情为主要手法,风格相对平实。这种分析既无高深的理论,亦无附会式强解,真正实现了本体意义上的“回归鲁迅”。

《启蒙先驱心态录》一书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得出的结论就显得令人信服,富有新意而经得起推敲。当然,作者在分析作品时,一些结论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作者在分析《过客》一文时,认为该文是鲁迅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化生态体验作为精神文化的荒原的外化,贯穿了悲壮、悲哀、孤傲和无奈的心态。这个结论大体是不错的,但把“过客”与“老翁”“小女孩”的关系解读为启蒙者与被动启蒙者的关系,却容易引起争议。

其实,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需要存在若干能引起读者争论的兴趣点。这也是孕育新的学术生长点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先驱心态录》构成了一种学术“召唤结构”,必将引起更多学者参与到《野草》研究的对话中来。

广告

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年第1期(总第7期)
主编:吴义勤 白烨

新时期小说语言变革研究
新时期小说语言探索的三个维度 张卫中
阿来小说中的隐喻表达及其自然生态观探析 付宁

作家传记研究
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现状与问题
兼及一种研究的新角度 张立群
施建伟《林语堂传》的童年叙事与林语堂的文学选择 赵焕亭
陈忠实文学年谱(1986-2000) 王金胜

当代文学期刊研究
文学期刊“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 牛学智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视觉建构与审美转向 刘莹
通俗文艺与《上海文论》的转型 尹林

最新文本
悬念:轻与重——读格非《月落荒寺》 南帆
新历史小说的探索与建构
——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段崇轩
西部精神的张扬与反思
——论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 杨光祖 周文艳
批评家与当代文学研究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概念 陈红星
批评立场的坚守与审美体系的建构——论夏康达的文学
与文化艺术研究 宋依洋 王科

网络文学研究
《雪中悍刀行》的魏晋风流
——兼议网络文学与传统的关系 刘奎涛
Z世代与网络文学 孙涛
蔡东《星辰书》研究专辑
仰望星空,追寻自由
——蔡东小说集《星辰书》的叙事伦理 饶翔江
论蔡东小说集《星辰书》的“深思之轻”
去标签的蔡东及其不俗之处 贺江
——以《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为例 刘琼

作家作品研究
论郭小东“铜钵孟三部曲” 姚轶婷 贺仲明
生命诗学视域中的“海味”小说——以刘刚、卢乃成、张炜的
创作为中心 王爱红 李继凯
一部新的警世恒言——读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 唐小林
戏剧性与被撕裂的社会阶层
——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王城如海》 王森林
红色经典谱系中的边地革命历史叙事
——评社族作家赵先平长篇小说《穿过密林》 王迅
论晓苏民间叙事的传承与创新 王海燕

编后记

邮发代号:80-831,地址:100125,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0号1507室。电话/传真:010-65925260,电子邮箱:zgddwxjy@163.com。定价:22.00元。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西部

2019.6 目录

西部头题·访惠聚小辑
文化的滋养(纪实文学) 熊红久
我从麦盖提走过(组诗) 刘涛
喀拉赤拉驻村记事 高一

小说天下
请原谅这个虚构的夜晚 鬼金娜
美人鱼与海边的十个夜晚 戴雅琳
亲爱的 王新梅

跨文体
魔鬼 阿舍
狩猎秘籍 阿舍
小镇人物备忘录 阿舍
草木来信 阿舍
诗无涯 泰不活等
一首诗主义 袁磊等

维度·新疆作家作品研究
三生三世,一路格桑梅朵(纪实文学) 丰收
树上一座纸上纪念碑,筑一道文学“西长城”
——丰收文学创作综述 李朝全

周边
这个花园是你的(小说) 【匈牙利】帕依·安德拉什
余泽民译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友好南路716号
电话:0991-4515235
邮发代号:58-65

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

野草

2020年第1期要目

短篇小说
好运 夏烁
对眼 古岸
出行记 黄方刚
大腕 赵经伟
我们为什么走到一起 民啸
一小片阴云 梁学敏
揭幕 戴雅琳
孰为边界 徐汉平
朝花 黄海今

散文
上海肖像 汗辉
草木气度 江江
目光 潘云贵
诗歌
蓝蓝的诗 蓝蓝
幻想之城的奇异景观(诗评) 朱黄
小述异 商略
异域风 董继平
沉默或低语 写出官场小说新境界 杨少衡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绍兴入选作品展 我们(国画) 吕国钢
憩幽(国画) 俞切民

邮发代号:32-97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3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5-1260 双月刊 全年价:60元
主管主办:绍兴市文联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136031
投稿邮箱:yczc1980@163.com peter-707@126.com
yecaozazi@163.com